

**编者按:**2019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新时代历史研究工作者须“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封贺信指明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在史学界产生热烈反响。为了深入学习《贺信》精神,本刊特邀了三位学者撰文,讨论中国史学体系构建的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周文玖教授《历史学界的崇高使命》一文彰显了历史学的社会责任,从学理上论证“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辨析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概念与内涵。中国历史研究院杨艳秋研究员《进路:“反思”特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一文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史学史研究亟需不断完善学科体系、开展当代史学史研究、拓宽史学视野、加强学科对话,并在当代史学评论中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与批评。四川师范大学刘开军教授《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一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形成中所受到的经学影响与子学渗透,总结了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化的四个阶段和三个特点,并指出在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来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中国史学的体系建设之路,希望能够引起史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

# 历史学界的崇高使命

周文玖

(北京师范大学 a.历史学院, b.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学,代表党中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发了贺信,在广大史学工作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本文就贺信内容,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角度,阐述了历史学的社会责任;认为,求真务实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求,致用是历史学的最终归宿,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新时期需要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关键词:**历史学;社会责任;基础地位;历史学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9)05-0058-09

**收稿日期:**2019-05-21

**作者简介:**周文玖(1964—),男,山东金乡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致信祝贺,反映了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的殷切关怀和高度重视。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亦深受鼓舞。习总书记的贺信,再次强调了历史的借鉴意义和中华民族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明确指出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对中国历史学提出了宏伟而具体的建设目标,并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sup>①</sup>当前,我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sup>②</sup>这是一个需要历史学且为历史学的繁荣提

<sup>①</sup>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2019年1月3日发布,2019年5月18日引用,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103/c1024-30502233.html>。

<sup>②</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

供了广阔空间的伟大时代。历史学界要满怀信心地迎接这个时代,自觉完成振兴历史学的重任,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为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智慧,担负起无愧于时代的崇高使命。

### 一 历史学的社会责任

在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当代,谈论历史学的社会责任,在一些主张历史学是科学的学者看来,似乎是削弱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偏见。经世致用,为社会服务和尽责,这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近代以来,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即它到底属于社会科学,还是属于人文学科,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即使主张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的经世功用也不可忽视,它的社会责任也不应受到怀疑。

首先,从史学的源头考察,历史借鉴是历史学产生的重要动因。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学科。人类一旦具有了历史意识,就把自己从低等动物中剥离出来,历史意识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重要标志。历史意识是史学诞生的先导。从历史意识到历史记录,这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自觉。最初的历史记录表现为传说,内容大多是英雄故事或氏族的由来,以口述的形式存在和传播。梁启超在谈史学的起源时说:“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兴会飏举。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蟠踞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口相传为古’也。”<sup>①</sup>梁氏的述论是合理的,并以民俗学资料作为依据。当文字产生以后,传说被记载下来,成为最早的历史内容。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继而是金文。甲骨文中的卜辞和金文中的铭文已包含自觉的历史记载意识的萌芽。《尚书》《诗经》《春秋》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有明显的历史借鉴思想,商周统治者在训诰中自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召诰》反复讲夏、商兴废的历史,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多士》探讨殷代兴亡的原因,并记载了周公对殷遗民的训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诗经·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在提醒周人要注意殷失败的原因。孔子修《春秋》,既记载了历史事实,又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贯穿其中。孔子自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sup>②</sup>可以这样说,史学是缘于人类向历史学习的需要而产生的,没有历史借鉴,就没有历史学的产生,历史借鉴思想是历史学的灵魂。

其次,中国的史学遗产异常丰富,这与中国悠久的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中国史学遗产的丰富,世所罕匹。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即《风俗论》)中盛赞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如果一个民族最早的编年史证明确实存在过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帝国,那么这个民族一定在多少个世纪以前就集合成为一个实体。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4000多年来,每天都在写它的编年史。”<sup>③</sup>我们不赞成伏尔泰把中国说成帝国,但他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指出中国重视历史的传统,还是很有卓识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尽管对中国史学有所贬低,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史学的连绵不断:“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sup>④</sup>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开山的学者,梁启超于20世纪初发表《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然到晚年,从建设中国史学的角度,也改变先前的认识,非常自豪地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sup>⑤</sup>中国史学的发达,首先与历代当政者的重视密切相关。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就是一位善于汲取历史智慧的人。秦亡汉兴不过是二三十年内发生的历史巨变。作为这一历史巨变的主要角色,刘邦本人都在疑惑,为什么强大的秦朝这么快就土崩瓦解了?为什么在楚汉战争中军事实力更强的项羽失败了?刘邦起初鄙视儒生,看重军事力量,对陆贾常常在他面前谈论《诗》《书》十分反感,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

<sup>①</sup>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

<sup>②</sup>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155页。

<sup>③</sup>伏尔泰《风俗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5页。

<sup>④</sup>黑格尔《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23页。

<sup>⑤</sup>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9页。

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的话对刘邦触动很大,他接受陆贾的建议,并希望陆贾为他总结经验教训,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于是概略地论述了历代存亡的原因,共写了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sup>①</sup>统治者对历史经验的渴求,迎来了西汉初年的史学兴盛,为司马迁撰著《史记》奠定了基础。历史经验总结对西汉政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西汉初年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效地巩固了西汉的统治。

唐朝初年设立史馆,修成了八部正史,体现了史馆修史的优势。这个成就与唐初统治者对历史的重视也是直接相关的。唐朝是继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分裂割据以及隋朝的短暂统一之后建立起来的皇朝。特别是一度强盛的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推翻,对唐初的统治者是深刻的教训。唐初统治者如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等能够直面历史,敢于用历史上的嘉言懿行、明君贤相来匡正自己的言行,用历史上的昏君暴君庸君的腐败残暴导致国破家亡时时提醒自己,表现出封建统治者对历史少有的自警勇气和自觉借鉴意识。武德五年(622),唐高祖下诏撰修魏、齐、周、隋、梁、陈诸代史,说:“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并要求史官撰史:“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sup>②</sup>这次修史活动虽然无果而终,但为唐太宗时期的大规模修史奠定了基础。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正式设立史馆,再次下诏,修五代史。七年之后,《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五部史书同时修成。唐太宗十分高兴,对史臣们的业绩给予嘉勉。他首先肯定了史书的作用,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瘴恶,足为将来之戒”,接着历数了秦始皇、隋炀帝害怕历史、毁坏史籍的荒唐:“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緘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并表明自己与他们对待史籍的不同态度:“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sup>③</sup>在《修〈晋书〉诏》中,唐太宗还盛赞读史书的好处:“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纚,临睨九皇之表”,并发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感叹。<sup>④</sup>唐太宗自觉运用历史智慧,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唐皇朝。没有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和总结,就不可能出现“贞观之治”。“史籍之为用”,在唐太宗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唐朝开史馆修史的范例,对以后历朝官修历史影响巨大。宋、元、明、清均成立专门的修史机构,编纂起居注、实录、会典、正史等;设立文献整理机关,整理国家图籍,编纂大型的丛书、类书,从而留下了浩瀚的史学遗产。

第三,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大家,均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人生关怀。司马迁以纪传体完成《史记》,其体裁体例为后世修正史者所尊奉。司马迁的史学地位,诚如梁启超所云是中国“史界太祖”<sup>⑤</sup>。《史记》不仅是“实录”之作,而且是司马氏父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的史学意识的体现。司马氏是史官世家,司马谈、司马迁先后为太史令。西汉的太史令负责保管国家图籍、编修历法、参与皇帝封禅活动等,记事修史虽然也是太史令的职责之一,但不是主要工作。然而,他们认为,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一部历史巨著,并把著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司马谈著有《论六家要指》,但修史工作没有完成,临终前对儿子司马迁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接受遗言,俯首流涕地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sup>⑥</sup>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因言获罪,为了完成《史记》,他隐忍苟活,接受官刑。《史记》是司马迁用生命谱写出来的巨著,开创了史学经世的学风。司马迁是一位有思想的史学家,他借用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说明自己撰写历史的意图。他多次表达自己的著史旨趣:“述往事,思

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699页。

②《史馆上·修前代史》,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55年。

③王钦若《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中华书局2003年。

④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中华书局2008年。

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5页。

⑥司马迁《史记》,第3295页。

来者。”<sup>①</sup>“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sup>②</sup>在写人物传记时，他注重选取有借鉴价值的史实入史，如他说：“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sup>③</sup>就是说，张良和汉高祖刘邦平时谈论的天下事很多，那些与天下存亡无关的就不写了。《史记》是一部富有“史义”的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刘知幾是唐朝的史官，参与唐朝实录、国史的编修，他以对史学发展的高度责任感批评历代史书之得失，指出唐朝史馆存在的问题，写下了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徐坚认为，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史官都应该置之“座右”的。刘知幾之所以写这部书与他认识史学作用的深刻认识有密切关系。他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sup>④</sup>也就是说，既然史学对国家和个人都有重要价值，就必须写好历史，就要解决史义不纯的问题，在总结前代史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使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著《史通》的动机，就在于此。杜佑是中唐时期的一个大史学家，做过多年的节度使，最后成为宰相。他在从政之余，以36年之力完成巨著《通典》。杜佑在该书《自序》中首先表达了自己的著述旨趣。他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sup>⑤</sup>就是说，他写的这部典章制度通史，是为施政服务的。这就明确地把史学与经世联系起来，对后世影响很大。清朝有《续通典》《清通典》之修撰。

宋朝是中国古典史学的极盛时代，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sup>⑥</sup>宋朝大史学家多、名著多。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sup>⑦</sup>张载是思想家，但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sup>⑧</sup>，却喊出了史学家的心声。文学家曾巩其实也是一个史学家，参与过校勘《南齐书》，他关于史书及史家修养的评论也反映了宋朝人的史学器局。他说：“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懿德非常之迹，将闾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梲机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sup>⑨</sup>司马光、张载、曾巩是同时代人，他们的这些言论反映了宋朝史学的学术格调之高。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之开山，倡朴学、重实学。清代的学者都很尊敬他，按照他的方法做扎实的学问，但他却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sup>⑩</sup>就是说，写史书是为当今提供教训的。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日知录》。关于《日知录》的宗旨，他说得非常明白：“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sup>⑪</sup>顾炎武穷一生精力写这部书，考据色彩虽然浓重，但还是为了供执政者所资取，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社会的繁荣和民众的幸福。

第四，近代历史学始终贯彻着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1840年后，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国遭遇了千年变局。历史学也随着世变而求新求变，并积极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自觉地以救亡图存为旨归，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发展为爱国主义史学思潮。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纂了《海国图志》，倡导开眼看世界，并提供了国人渴望的外国史地知识。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19世纪50年代，

① 司马迁《史记》，第3300页。

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7年，第2735页。

③ 司马迁《史记》，第2047-2048页。

④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03-304页。

⑤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⑥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72页。

⑦ 司马光《进书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5年，第9607页。

⑧ 张载《性理拾遗》，张载《张横渠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⑨ 曾巩《南齐书目序录》，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2007年，第1037页。

⑩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

⑪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27、98页。

在边疆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姚莹的《康猷纪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夏燮的《中西纪事》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一方面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外史地著作,另一方面也是反对外国侵略、抗敌御侮的经世之作。而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是中国史家走出国门,以世界性眼光写出的东、西国别史代表作,不仅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显示出比较的意识。进入20世纪,在反对列强“瓜分豆剖”“蚕食鲸吞”的斗争中,历史学更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为国家主权完整、民族富强而斗争。梁启超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sup>①</sup>章太炎说:“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sup>②</sup>“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用意在于:“把我们祖先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合法地承受我们国民应当享有的遗产,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所被剥夺的是自己的家业。”<sup>③</sup>主张只整理史料而不著史的傅斯年,因时局的需要而撰写了《东北史纲》,用史实驳斥日本帝国主义宣扬蒙满地位未定论,指出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即使在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高喊“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强调史学只是史料学,其实也是他发出的学术自强于先进国家之林的呼唤。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把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抗日战争有机结合,奏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华丽乐章。

第五,历史学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历史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小至个人修养,大到国家方略,都可以在历史中寻求解决之道。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没有鸿沟,今天是从昨天发展来的,而今天终将过去,成为新的昨天。人类历史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因此,人类创造历史时,总是要回头看一看历史,从历史中寻求根据和信心,从历史中探寻答案,汲取智慧。这是人类的天性,任何民族都是如此。英国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sup>④</sup>这主要是说,历史学家与他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他选择什么问题进行研究,他对历史的理解,都受时代的影响。他这里所说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指“历史学”。事实上,客观的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历史的每时每刻,都是现在跟过去的对话,都包含着继承和发展。然而,历史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现实的人要认识这个客观存在,必须借助历史的记载。而历史记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所以,历史学承载着保存人类文明、创造人类文明的双重使命。人类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组成的。历史学属于实践科学、经验科学,历史事实是它的核心,是最能体现它本质属性的内容。历史学记载的历史事实丰富多彩,包括历史人物的言行及荣辱,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状况,历史上的民族、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产生、内容、成效,王朝或皇朝的兴衰败亡,等等。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讲,历史学对提高国民素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友爱教育,对于民族精神的阐释和发扬,以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领导干部的培养来说,领导干部应具备良好的历史思维,历史学对于提升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国民教育而言,历史学能够有效地培养公民的爱国心、社会责任心、科学素养、文明素养(有些国家之所以把其本国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

第六,强调历史学的社会责任、致用功能,与历史学的求真性并不矛盾。求真和致用对历史学而言是同等重要的,失去任何一个都不是正常之态。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少哪一个,都不可能翱翔高空、平稳行远。上面重点论述了历史学的致用功能和社会责任,但决不是因此而轻视历史学的求真性。致用是历史学的最终归宿,而求真则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求。失去了“真”,历史学怎么会有用?真实对于历史学来说就如药物的有效成分,没有有效成分的药物是无效药;而造假的历史学对社会的危害就如同含有毒素的假药一样对人体无益而有害。史学的求真和致用是辩证统一的。在史学的求真和致用问题上,应防止以下片面化倾向。一是在求真的旗号下,过分追逐细枝末节。20世纪50年代,洪秀全有无胡子的研究曾经遭到揶揄。研究洪秀全有无胡子,对

①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②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③顾颉刚《纪念辞》,《禹贡》1935年第3卷第1-3号。

④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页。

弄清洪秀全的容貌,对戏曲中的人物化妆,也不是没有意义,但如果史学界的趣味集中在这儿,特别是重要史学家总在这样的问题上津津乐道、流连忘返,则会把历史学引到歧路上去。近年来的史学“碎片化”现象就有这个趋势,值得史学界自省和警惕。二是将历史学功用简单化,致使实用主义史学乃至庸俗化史学大行其道。历史学的社会功用主要是提供历史智慧。人们在现实中运用历史知识,其实就是发挥历史智慧的作用。在运用历史知识时要注意因时变通,否则就可能闹出刻舟求剑的笑话。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绳乎?”<sup>①</sup>王夫之也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为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sup>②</sup>他们都强调历史的借鉴性,而反对照搬照抄历史,认为不可古今混同。此外,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要以尊重历史为前提,切不可把历史视为可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这方面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有沉痛的教训。三是史学功用狭隘化和急功近利化。有的史学研究专业性很强,与现实的距离也很远,堪称“冷门”,单纯对现实是否有用的角度很难看出其价值。如果因此就弃之如敝履,这样的学问也许就失传或中断了,真成了“绝学”。有的学问属于国家的文化宝藏,不能以有用与否来衡量。宝藏并一定有实用价值,但却有文物价值、珍藏价值。这样的学问失传了,将来不得不向外国人学习,那可就是中国史学界的“奇耻大辱”了。因此,对于史学的求真和致用问题,还是要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长远一些。

要而言之,历史学虽然是过去为对象,但它面对的却是现在和未来。它对历史的记述,对历史盛衰之理的探讨,无不是为了推动历史的发展。

## 二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两次做出这个论断。这个论断,非常明确地指明了历史研究的基础地位和重要地位,值得史学界深思。

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历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许多属于历史类的著述,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恩格斯多次称赞马克思对法国社会变动的洞察力,认为这种洞察力来源于他对法国历史的熟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德文第三版序言》中,恩格斯说:“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未使他感到意外。”<sup>③</sup>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关于人类早期文明史的经典之作,对从历史的角度证明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具有重要意义。这部书一定意义上也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的学术结晶。恩格斯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说:“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引用。”<sup>④</sup>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等领域,包含众多社会学科的知识 and 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的。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sup>⑤</sup>马克思、恩格

<sup>①</sup>司马迁《史记》,第878页。

<sup>②</sup>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3页。

<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6-667页。

<sup>④</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13页。

<sup>⑤</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0页。

斯认为,哲学、文学艺术、法学都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的专门学问,“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sup>①</sup>因此,任何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历史的说明。他们明确地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我们所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sup>②</sup>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苏联史学家茹科夫这样解释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对现象和过程进行研究时,必须遵循历史主义原则,即必须以运动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任何进程和现象,阐明其起源及由某一客体的运动方向所决定的今后的演变。”<sup>③</sup>茹科夫从方法论的角度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著名论断,可谓慧眼卓识。然而,即使是从字面上理解,即从历史学的内容来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也是成立的。首先,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的产物,对科学的认识需要到历史中去探讨。其次,任何学科都有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只有了解其历史,才能认识其学科。第三,一切科学都会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史的发展而发展,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密切相连的。第四,历史学催生了一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如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等,而历史学的科学功能也是其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因此,一切人类的文明,一切科学的知识,都打上了历史的烙印,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中国古代有“六经皆史”之论,至晚清时尚有龚自珍“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sup>④</sup>之说,这都反映了中国具有将史学看作一切学问基础的悠久传统。在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过程中,近代史学的先驱也认识到史学的基础地位,对史学的作用予以特别的重视。梁启超 20 世纪初亡命日本期间,与众多留学日本的学生有交往,这些留日生学习不同的专业,有的学政治,有的学经济,有的学法律,等等,但梁启超告诫他们,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应对历史学有良好的修养。他说:“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篋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务透彻数千年来列国重要之事实,文明之进步。知其原因及其结果,然后讨论诸学,乃有所凭藉。不然者,是犹无基址而欲起楼台,虽劳而无功矣。”“欲治政治、经济、法律诸学者,则历史为尤要,必当取详博之本读之。”<sup>⑤</sup>至 20 年代,他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历史研究法时,再次重申这一点,指出:“凡治各专门学之人……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sup>⑥</sup>“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sup>⑦</sup>章太炎学问渊博,学术造诣精深,被誉为国学大师,但历史学是他的根基。朱希祖评论说:“先师学术,虽极广博,然史学实占其大部分,不特史之本身,即经学、文学,亦包括史学之内,所撰文章,亦多以史为根柢也。”<sup>⑧</sup>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给历史学下了这样的定义:历史学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sup>⑨</sup>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一是人类的生活,二是作为人类生活的产物的文化。他认为最广义的历史学由普通历史学和特殊历史学组成。普通历史学分为个人、氏族、社会集团、国民、民族、人类的记述历史(个人史、氏族史、社会集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和历史理论(个人经历论、氏族经历论、社会集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特殊历史学分为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宗教、文学、哲学、美术、教育的记述之部(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伦理史、宗教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教育史)和理论之部(政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15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146 页。

③ 茹科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共产党人》1980 年第 3 期。

④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81 页。

⑤ 梁启超《东籍月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90 页。

⑥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 35 页。

⑦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169 页。

⑧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朱希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347 页。

⑨ 李大钊《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13 页。

学、经济学、法理学、伦理学、宗教学、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这个体系,体大思精,远远超出现代历史学研究的范畴。然而,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达的思想“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是相通的,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缜密的理论思考,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即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不仅根据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得出这样的认识,就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类似的观点。美国史学家乔治·伊格尔斯在其《西方史学的历史演变》中提出:“从理论上来说,人类一切都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一切时代、一切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与人类有关的一切科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文学与神学——都是历史的科学。总之,既然历史是以过去这个广漠无垠的领域为对象的,它就存在于一切人文科学中,因此它就是一个综合者,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sup>①</sup>

社会科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sup>②</sup> 既然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那么,历史学就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紧密相关。从学科体系的角度看,历史学地位之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 三 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他说:“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③</sup>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他再次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sup>④</sup>,进一步明确了构建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性、紧迫性。

中国是一个历史学大国,古代史学光辉灿烂,举世公认。近代以来,逐步与世界接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成就斐然。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形势下,历史学的发展需要上一个新的台阶。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既是实现新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新目标的具体体现。这是历史学界面临的一个新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加大力度进行研究。

第一,任何一个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都应该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个体系之有无,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自中国史学现代转型之后,史学界一直在探索中前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历史学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迄今,总结和构建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条件已经具备。

第二,研究和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自觉推进学科发展的需要。当一个学科有了相当的发展之后,需要对学科的未来发展制定一个长远的规划。一个学科的建设,有规划和没有规划,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会出现高低之分、有序无序之别。习近平总书记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sup>⑤</sup>构建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首先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这需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研究机构在广泛征求意见、扎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决。

第三,新时期构建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首先要弄清概念。也就是说,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涵是什么?在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哪些成果?“历史学学科体系”应包括历史学科的构成和分类,纵向层次、横向层次及其相互关系,要论述专业与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

<sup>①</sup>伊格尔斯《西方史学的历史演变》,转引自: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0页。

<sup>②</sup>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

<sup>③</sup>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

<sup>④</sup>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2019年1月3日发布,2019年5月18日引用,<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103/c1024-30502233.html>。

<sup>⑤</sup>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

教学手段、学科建设诸多关系、机构设置等问题;“历史学学术体系”是指对历史学学术活动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则集合体,包括历史学的学术精神、学术规范、学术方法、学术伦理、学术功能、学术评价、学术传播等。“历史学话语体系”是指由最能反映历史学的内容、观点及编纂形式的概念、范畴和术语所构成的表达系统。关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理论探讨,需要结合历史学的实际逐步深入。

第四,构建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上下功夫。中国史学历史悠久,积淀丰厚,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也吸收他国史学之优长,使自身发展壮大又保持民族风格。因此,在构建这三个体系时,要熟悉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将中国历史学置于世界历史学发展的潮流中,应努力让世界既认识到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价值并能够接受,又展现出中国的民族性和特色,以增强中国历史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像习总书记所讲的那样,注意把握三个方面:1.体现继承性、民族性;2.体现原创性、时代性;3.体现系统性、专业性。<sup>①</sup>

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既要绘制蓝图,又要开工建设。既要做出宏观的理论探讨,又要进行具体、扎实的研究工作。要让历史学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挥更好的基石作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多的历史智慧;要引领国际史学潮流,让国际史坛更多地听到中国史学界的声音。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不仅要做一个历史学大国,更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强国。

中国历史学界,使命崇高,任重而道远!

## Lofty Mission of the Historian Academic Circle

ZHOU Wen-jiu

(a. The Faculty of History, b. Center for studies of Historical Theory & Histori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history.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a new departmen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hich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among historia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ography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and points out that truth-seeking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history and application is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history. The history has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social science system, and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social science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isto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 status; discipline system

[责任编辑:凌兴珍]

<sup>①</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